

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底色、文明意蕴与世界意义

乔景昊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市, 100101)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至上”为核心价值, 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模式。通过从价值底色、文明意蕴与世界意义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指出“人民至上”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动力与成果共享全过程, 引导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实践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新选择, 也为全球治理与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 人民至上;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不仅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更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探索。其突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传统迷思, 在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中, 展现出独特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这一宏大叙事中, “坚持人民至上”绝非抽象的政治宣示, 而是贯穿其理论、实践与目标的核心价值灵魂, 构成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成为中国道路、何以成就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密钥。

“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价值底色, 是引领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文明理念, 同时也是其为全球发展与人类未来贡献中国智慧的意义所在。本文将从“人民至上”的价值底色、文明意蕴和世界意义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内涵的理解, 在实践上明晰其未来发展的价值航向, 并为思考人类文明的多元可能提供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的重要参照。

一、价值底色：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规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道路最独特的现代化实践, 其与西方现代最大的不同并不是在于对科学技术研发或是经济建设, 而是在价值观上最大不同, 即“人民至上”的理念。这个理念并非抽象的政治口号, 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动力与成果分配的根本规定性, 与西方现代化的“资本至上”的价值底色有最本质的区别。通过对价值论基础、目标导向和动力来源三个方面的探讨, 系统地阐述“人民至上”如何内在地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一) 价值论基础：从“现实的人”到“人民主体”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秉持着“人民至上”的原则, 其有着深厚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它并非凭空产生, 而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的本体论认知之上, 并由此形成出一套完整的、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论体系。

“人民至上”是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根本原理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彻底颠覆了将历史看作王侯将相的历史或是绝对精神产物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 强调物质生产实践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而从事这些实践的正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科学论断, 毛泽东强调“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与建设, 都要建立在这一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清醒认知之上。这也意味着,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精英的现代化, 而

是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出发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总和。这与西方现代化中所蕴含的“精英主导”或“资本驱动”的历史观形成了最本质区别。

“人民至上”构建了“为了谁、依靠谁、由谁共享”的完整价值闭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不仅解释了历史的动力来源（依靠谁），而且明确了历史发展的价值归宿（为了谁）。中国式现代化将这一理论彻底实践化与系统化。其一，“发展为了人民”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追求。党的初心使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制定的基础，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某个某些特殊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其二，“发展依靠人民”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3]”其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标准以及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现代化的成功与否，最终是要由人民来评判，要看是否增进了人民福祉、促进了共同富裕，让人民享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上”核心价值观与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核心价值观有着截然对立的的不同。西方现代化在其历史进程中，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其内在驱动力与核心还是“资本逻辑”的无限增殖。这种观念，可能会导致人的异化、社会的撕裂以及全球发展的不平衡。而中国式现代化旗帜鲜明地将“人民”置于最高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4]”这不仅是对执政理念的明确，同时更是一种文明价值的宣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不是资本的积累，而在于人的发展；并不是“物”的统治，而是“人”的解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中，要利用和驾驭资本来发展经济、创造财富，但资本的运行必须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规范和引导，并最终服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人民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与驾驭，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底色的最鲜明体现。

（二）目标导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至上”的价值底色投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之中，使之超越了只对单一物质增长指标的追求，从而升华为一个以人民多层次、全方位需要满足为核心的综合性、人本化目标系统。

目标系统的核心，在于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奋斗的终极坐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精准地回应了这一矛盾转变，目标从解决“有没有”的基础性问题，全面转向解决“好不好”的高质量发展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涵盖了“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以及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下，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任何单一维度的发展都不能称之为现代化，只有五位一体的发展才能称为中国式现代化

在这一目标指引下，“共同富裕”被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了其价值目标的普惠性与公正性。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全体人民在高质量发展中共享成果、逐步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历史过程。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因此，“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中央深刻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5]”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凝聚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

的实践中，始终将对物的追求与对人的发展结合起来。现代化不仅仅是 GDP 的增长和技术的迭代，更是人的能力提升、个性舒展、精神丰富和社会关系和谐的过程。不管是对促进教育公平、建设健康中国，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其深层意蕴都是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扫清障碍。这使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追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动力来源：依靠人民创造历史的伟业

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无可替代的力量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每一项成就，从“两弹一星”的突破到高铁网络的铺就，从数字经济的前沿探索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其根基都在于亿万人民的辛勤劳动、聪明才智和首创精神。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本质上是一场尊重和激发人民首创精神的伟大革命，从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始，诸多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都发端于基层群众的实践探索。这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动力模式，确保了现代化进程始终拥有不竭的活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将“人民主体”思想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秉持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群众路线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成功之路的根本工作路线。“党同人民群众一道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始终坚持依靠人民，贯彻群众路线，赢得民心支持，激发人民主体能量的成果^[5]。”进入新时代，这一传统优势进行制度化、体系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一种在党的领导下，覆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贯通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主形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基层群众自治等丰富渠道，人民不仅在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制定中有广泛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也在基层治理和社会事务中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的伟业的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主体性与历史主动性相统一”的实践形态中达到高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辩证图景：党依靠人民推动现代化，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人民的目标就是党的目标，人民的力量就是党的力量。党与人民风雨同舟、共同奋斗正是“人民至上”价值底色在动力层面的最高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克服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核心密码。

二、文明意蕴：人民至上对现代性文明的超越与重构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民至上”价值原则，不仅定义了其自身发展的边界，更是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展现为一种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深刻批判与积极重构。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下，来剖析“人民至上”如何引导中国式现代化去超越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文明困境，并在“两个结合”中塑造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导、和平包容共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赋予现代化进程以深厚的文明意蕴。

（一）批判与超越：扬弃“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

现代文明，从诞生起就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紧密相连。马克思描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所开启的现代文明困境，“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具体指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直接推动力量，这种转变的本质是资本逻辑对世界空间的重构。^[6]”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文明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使也陷入了根深蒂固的悖论。

资本主义文明的困境首先人的异化。资本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将一切社会关系笼罩在交换价值之下^[7]。其文明成果——庞大的商品堆积、先进的科学技术、复杂的市场体系——本应是服务于人类发展的工具，却在资本无限增殖下，反客为主，成为支配人、异化人的外在力量。劳动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沦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的价值不再由其个性与创造性衡量，而由其创造交换价值的能力所定义。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文明，最终导致社会关系的货币化、精神世界的扁平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敌对化。资本逻辑中的对抗性

矛盾，使得这一文明形态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周期性的危机、剧烈的社会撕裂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心-边缘不平等结构，所以“文明”光环下掩盖的是深刻的系统性风险。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至上”为核心价值观，并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困境的自觉超越与实践性“驾驭”。这种超越并非简单地拒斥现代性要素，而是通过“驾驭资本”来“利用资本”，最终导向对资本逻辑的扬弃^[6]。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其活力必须得到释放。因此，中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性地将资本这一具有强烈排他性和支配性的力量，纳入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与发展目标之中。通过持续的制度建设、法治规范与战略引导，确保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同时有效遏制其无序扩张、脱实向虚的负面倾向，防止其凌驾于人民利益与社会公益之上。这一“驾驭”过程的本质，是将文明发展的主导权从抽象的“资本”手中夺回，重新交到“人民”手中。它标志着文明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向：从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工具理性”至上，转向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理性”引领。

这种超越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它破解了“现代化=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单一线性性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现代文明形态也并非只有一种。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探索出的这条道路，不是对西方模式的修补或追赶，而是在资本主义文明一切积极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对其进行的批判性重构与创造性转化。这意味着，一种能够有效调和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民族复兴与全球合作的新型文明是可能的。

（二）建构与新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实践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的“属人”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将人视为实现资本增殖的要素和工具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现实的人”及其自由全面发展置于中心位置。这体现在发展目标的设定上，超越了单纯的GDP崇拜，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涵盖物质富足、政治民主、精神富有、社会和谐、生态宜居等全方位需求。也体现在发展过程的安排上，无论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还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着力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其根本目标都是确保发展的成果能够公平惠及每一个人，为每个人的潜能发挥和生命绽放创造更加平等、更可持续的社会条件。这是将马克思所设想的，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理想，转化为扎实的阶段性社会工程，使文明进步的尺度真正回归到人本身。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遵循“和而不同”共生逻辑的“包容”文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往往伴随着文明冲突、霸权主义和中心对边缘的支配。而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则秉持“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智慧，开创了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文明新路。在国内，它表现为“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追求物质与精神、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摒弃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牺牲其他领域的畸形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沟通，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8]”通过“一带一路”等实践，中国并非输出自身模式或建立势力范围，而是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促进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共同繁荣。这种文明交往方式，是平等互鉴的，而不是文明优越的思想。以对话合作化解文明冲突，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崭新的交往伦理。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制度保障”与“持续改革”动态统一的“韧性”是。新型文明形态的稳固与活力，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的支撑与革新。中国式现代化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文明的构建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更是在制度层面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创新。通过不断的改革，不断破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稳定、管长远的制度安排。这种以改革驱动制度演进，又以成熟定型的制度保障文明成果的模式，使得新型文明形态具备了强大的自

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够有效应对内外部的风险挑战，保持文明的生机与韧性。

（三）文化根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为新时代的“人民至上”观奠定了丰富的文化基因。早在夏商时期，《尚书》中最早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随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重视民本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价值取向。如儒家孔子提出“仁政”思想，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则提出了“君舟民水”，道家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等，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但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民”有别于现代生活的“民”，传统民本思想根植于农耕文明，蕴含着浓厚的封建色彩，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致力于加强制度保障，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重要政治制度，构建起科学、有效、系统的制度体系，并将这些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具体而现实的民主实践，使人民意志得到充分体现，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通过构建系统的制度体系，“从而充分发挥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制度合力和整体效应，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全链条各环节都能听到人民的声音。^[9]”通过建立健全诉求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矛盾调解机制，有效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全面落实。这充分实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則，生动体现了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地位，彰显了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根本权利。这一系列制度与实践，在人民主体权力的实现方面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三、世界意义：人民至上为全球发展与人类未来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所高举的“人民至上”旗帜，不仅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更穿越国界，为在百年变局与时代挑战中艰难求索的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它超越了地域与文化的局限，以其内蕴的普遍性价值与成功的实践范式，在全球治理、现代化道路探索以及人类文明进步三个维度，贡献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展现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提供现代化道路新选择

“人民至上”在国内治理中的成功实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基准。全球治理的终极目的，当是增进全人类福祉，而非维护少数国家或利益集团的霸权。中国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将国内发展的成败系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一逻辑投射到全球层面，便体现为坚定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价值并非任何文明或国家的专利，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在漫长历史交往中形成的共同追求。

基于“人民至上”发展而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全球性挑战提供了超越对抗的总体框架。面对气候变化、疫情蔓延、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植根于中华“天下大同”“和合共生”文化基因，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这一理念摒弃了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和以邻为壑的旧模式，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人民至上”蕴含的“共享”原则，为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某些规则，客观上固化了发展差距。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内追求“共同富裕”，在国际则主张“合作共赢”，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更加平衡、协调、包容。

（二）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打破迷思与多元自主的路径启示

长期以来，“现代化”往往被等同于“西方化”，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被包装成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普世道路”乃至历史的终点中国式现代化的崛起，以其恢弘的实践和独特的逻辑，彻底打破了这一迷思，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注入了强大的信心与宝贵的经验。

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真理。中国没有照搬任何外国模式，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自身历史、文化与现实，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实际、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这条道路证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只有单一模板。有效的经济体制、政治架构和社会政策，必须深深植根于本国土壤，回应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中国在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成功处理了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发展与稳定等一系列复杂关系，这些基于自身实践的探索与智慧，为其他国家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勇敢探索自身的“石头”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方法论”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为发展中国家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范式。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因过度依赖外部资本、技术或制度输入而陷入依附性发展困境，甚至丧失部分主权。中国则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同时，中国又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对外开放，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关键在于，中国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所有的引进、借鉴、合作都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根本利益，并且在开放中注重维护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和制度安全。这种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拥抱世界的做法，展示了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全球格局中把握发展主动权，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维护自身利益、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示的“有效治理”与“长期稳定”，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对秩序与发展的核心关切。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简单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得到人民广泛认同的、能够保障社会长期稳定的治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在于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战略规划执行能力的执政党，以及一套能够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行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种“治理效能”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和组织保障。

（三）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智慧：超越“中心论”的文明观与未来图景

在文明层面，“人民至上”理念及其实践，不仅是一种发展模式创新，更是一种文明观念的革新。它挑战了长期主导世界的“西方中心论”文明观，为思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以及未来演进方向，贡献了充满中国智慧的新叙事。

这一新智慧的核心，在于确立了“文明平等观”与“文明交流互鉴观”。“西方中心论”隐含着文明等级观念，将非西方文明视为落后、待开化的对象，为历史上的殖民扩张和现实中的文化霸权提供了借口。中国则基于自身多元一体的文明传统和成功的发展实践，明确提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这种理念彻底否定了文明优越论，赋予所有民族文明以平等的尊严与价值。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认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人民至上”推动形成了一种聚焦于“共同性”与“未来性”的人类文明新叙事。面对全球性挑战，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聚共识。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种新叙事的基石。它们不再强调文明或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对立，而是着力挖掘和凝聚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人民对于和平、发展、公平、福祉等目标的共同向往。这种叙事将人类的注意力从历史上的恩怨与现实的纷争，更多地引导向对共同未来、共同责任的思考上。

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整体性、包容性的文明实践，昭示了人类文明向更高阶段跃升的潜在方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异化、社会分裂与生态危

机。中国在共同富裕、生态文明、数字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领域的实践，都可视为这种新文明形态的早期萌芽与制度实验。虽然这一进程远未完成，但已然为人类思考“现代化之后”的文明图景——一个更加以人为本、更加和谐可持续的文明阶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思想火花与实践参照，激励着全人类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共同未来而持续探索。

结语

“人民至上”绝非停留于政治宣示层面的理念，而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全过程的价值灵魂与文明标识。它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来，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完整逻辑，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奋斗目标；它引导中国在实践中成功驾驭资本逻辑，超越西方现代性文明困境，塑造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和平包容共享为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最终，它以其内蕴的普遍关怀与实践成效，为变革全球治理、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思考人类共同未来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中国智慧。深刻把握“人民至上”这一核心，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成功、何以独特的钥匙，也是展望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交汇前景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内容字号:楷体小五)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 [3]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J].求是,2025(1).
- [4]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21.
- [5] 齐远飞.对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特质的三维阐释[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4):88-91.
- [6] 郑康康,黄明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文明意蕴[J].学术探索,2026(3):12-20.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27.
- [9] 陈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J].宁夏党校学报,2023,25(1):90-97.

People First: The Value Essence, Civilizational Implication,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QiaoJinghao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100101)

Abstrac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akes "people-first" as its core valu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apital-first" model of modernization. By discuss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underlying value, the implic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orld, it points out that "people-first" is rooted in the Marxist view of the people, permeates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goals, driving forces, and sharing of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guiding it to transcend the dilemmas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political, spiritu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s. China's practice not only provides new op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xplore independent paths to modernization but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People first;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乔景昊，男，汉族，安徽滁州人，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